

太伯、仲雍奔荆蛮地望考

王岳群

(武进博物馆 江苏武进 213100)

Huashan and Shecheng, Jiangy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destination of Taibo and Zhongyong's emigration to Jingman. Shecheng built by Taibo probably was the original cradle of Wu station.

Key words: Taibo and Zhongyong Shecheng

内容提要 太伯、仲雍“奔荆蛮”的地望为今江苏江阴,具体地点为花山和余城,余城为太伯所筑,并可能是吴最初的立国地。

关键词 太伯、仲雍 余城

中图分类号 K225

文献标识码 A

太伯、仲雍奔荆蛮,是我国古代史上令人关注的一件事,尤其是所奔之地望,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庶几成一历史悬案。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苏南地区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和吴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重又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为最终解开太伯、仲雍奔荆蛮之谜奠定了基础。

太伯、仲雍奔荆蛮之事,初见于《诗经》、《国语》、《周礼》、《左传》等先秦史籍,但均语焉不详。《史记》稍详,但只言“奔荆蛮”,并未言明“荆蛮”为何地。《吴越春秋》则明确了地望,但后学存疑颇多。将文献记载和以往的研究归纳起来,太伯、仲雍奔荆蛮之地望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太湖流域说。地望为今江苏无锡的梅里。其主要依据是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三国魏王象等编的《皇览》、唐初李泰等著的《括地记》及宋以降的一些地方志等。这是传统的观点;二是宁镇地区说。具体地点在今江苏镇江丹徒一带。这是学术界根据宁镇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对

该地区所出大量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是陕西宝鸡说。具体地望为今陕西省宝鸡市区一带^[2]。

笔者同意太湖流域说,但其地望不在无锡梅里,而在今江苏江阴。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材料试考如下。

一 江阴概况

江阴地处江苏南部,位地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的西北隅。东邻张家港、常熟,南接无锡,西连武进,北枕长江。江阴地理位置重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誉称。境内河湖纵横,秦望山、花山、绮山、定山等山呈东西向横亘全境中部偏北处。江阴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遗存的文物古迹众多。境内现有长山遗址、南楼遗址、璜塘降遗址、陶城遗址、高城墩遗址、望海墩遗址、花山遗址、余城遗址、东西舜城遗址、莫城遗址、利城遗址等古遗址数十处,尤其是古城遗址较多。

二 近年的考古发现

近年来江阴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较大,

收稿日期 2002-06-19

收获颇丰,除新石器时代遗址外,还发现了一些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如花山遗址、余城遗址,尤其是后者,填补了这一地区这类遗存的空白,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下面就此作扼要介绍。

花山遗址 位于江阴市云亭镇花山行政村。遗址所在地是一片略高于四周的台地。遗址范围较大,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1998 年冬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1]。从文化面貌上看,花山遗址主要有石器、陶器,还有一块青铜炼渣。陶系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和硬陶、原始瓷。其中以夹砂红陶为大宗,主要器形有釜、鼎、甗、鬲等,其中又以釜、鼎为多,分别占 31.22%、20.15%;其次是泥质红陶,主要器形有澄滤器、罐、盆、豆、盘、壶等,其中以澄滤器为多;再次是泥质灰陶和黑皮陶;硬陶和原始瓷仅占 3.17%。几何印纹多见于泥质陶上,主要纹饰有绳纹、梯格纹、方格纹、条格纹、云雷纹、叶脉纹、复线曲折纹、圈点纹等,其中以梯格纹为主,占 12.26%。

余城遗址 位于江阴市云亭镇花山行政村。遗址大致呈长方形,南北最长近 800 米,东西最宽近 500 米,总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 2000 米,残高 1~8 米。是一处大型城址。城址所处地势较高,其西侧为河道,东、南、北三面为低田,低田外地势又复抬高,基本与城内持平。低田处明显低于城墙 4~5 米,据分析可能为湮没的护城河。2000 年 3 月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试掘,解剖了城墙等^[2],2001 年秋至 2002 年上半年又在城内北部进行了发掘,发现大型干栏式公共建筑一处。余城的文化面貌主要有青铜小件、石器和陶器。陶系有夹砂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印纹硬陶、原始瓷,其中以泥质红陶所占比例最大,主要器形有罐、盆、豆、澄滤器;其次是夹砂红陶,主要器形有鼎、釜、甗;硬陶和原始瓷占 14.19%。主要纹饰有梯格纹、回纹、云雷纹、条形方格纹、复线曲折纹、绳纹、弦纹等,其中以梯格纹为主,占 31.5%。城墙系堆筑。

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有几个特点:一是文化内涵基本一致,如花山遗址 II 型 A 式盆形鼎(G2:28)和余城遗址 TG1 ④:11 盆形鼎形制完全相同;花山遗址的 G2:19、G2:18 澄滤器与余城遗址 TG1 ④:27、TG1 ④:28 形制完全一致;花山遗址的 G2:68、G2:66、G2:b14 宽斜沿釜与余城遗址的斜沿釜形制一致,等等。二是相互之间又

有区别,如余城遗址炊器的数量远远少于花山遗址,余城遗址以盆形鼎为主,不见花山遗址的鬲、罐形和盘形鼎;余城遗址所出陶器以泥质陶为主,而花山遗址所出陶器以夹砂陶为主;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陶器上的纹饰以梯格纹为主,但花山仅占 12.26%,而余城占 31.50%;硬陶和原始瓷,花山占 3.17%,而余城占 14.19%。三是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均不同程度受周围文化的影响,如龙山文化、马桥文化、湖熟文化等,但又表现出明显的自身特点。

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的年代,据报告:花山遗址为距今 4000~3300 年左右^[3];余城遗址为距今 3600~3000 年左右^[4]。

三 太伯、仲雍奔“荆蛮”即江阴考

江阴位于太湖平原的西北隅,其西为武进,武进以西即为宁镇地区。众所周知,江阴和武进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属太湖流域文化区,其文化发展序列与太湖流域其它地区是一致的,而宁镇地区属另一文化区,也有自身的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阴和武进均处于太湖流域与宁镇地区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这从江阴、武进的 cultural 面貌上也可得到证明:如武进的孟城一带据笔者调查即有湖熟文化的台型遗址;江阴出土的商周时期遗物也明显带有湖熟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在花山遗址的 H7:3 素面鬲^[7]和北阴阳营 H48:60 素面鬲^[8]比较接近,余城遗址的 TG1 ④:28 澄滤器^[9]和北阴阳营 H45:62 II 型澄滤器^[10]基本一致等等。既然是交汇地带,相对而言是两种文化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可能太伯、仲雍一开始奔向何地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由于一路奔走,并在选择落脚点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商文化的阻挡,甚至发生冲突,所以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寻找一个商文化势力薄弱,甚至远离商文化势力影响的地方方能立足,“因为太伯、仲雍要想不借助军事力量而已形成的政治核心或军事核心的方国或部族站稳脚跟,以至创业立国,是不太可能的。”^[11]因此太伯、仲雍不得不沿大江而东移^[12],寻找这样的落脚点。

太湖流域自良渚文化之后,便进入一个文化发展的低谷时期,原因尚不清楚,但这已为考古学材料所证实。虽然学术界有人认为马桥文化是良渚文化的后续,但已是强弩之末,远不能与良渚文化相提并论,亦不能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相比,这种状况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春秋时期方有所改观。太伯、仲雍出奔的时间,史籍

无明确记载,一般均谓商末周初。考太伯、仲雍系周太王即古公亶父之元子和次子,周太王死于商武乙二十年^[13],据《夏商周年表》,商武乙在位是公元前1147~1113年^[14],则周太王大致死于公元前1127年。太伯、仲雍出奔时,周太王尚未去世,但已病,所以太伯、仲雍才有机会托名去衡山采药而至“荆蛮”,这样太伯、仲雍出奔的时间应在公元前1127年前的几年中。而太仲、仲雍扶老携幼,又历经翻山越岭、渡河过江,这样艰难险阻的长途跋涉,加上一开始可能无明确目的地的时间耽搁,因此太伯、仲雍最终到达目的地,少则数月,多则1、2年。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云:“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明确指出周太王死时,太伯、仲雍已到达“荆蛮”,但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如此则太伯、仲雍到达目的地即“荆蛮”的时间为公元前1128年左右。这个时间相当于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第三期公元前1300~1000年^[15]的中期阶段。尽管在此之前太湖流域明显受到商文化因素的影响,如“觚、觶、簋、瓦足盘、鸭形尊、鬲底盆、平底盆、器盖等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中的同类器十分相近”^[16]但青铜器很少,且仅见一些青铜小件,始终不见青铜容器。而宁镇地区则大相径庭,湖熟文化的第一、第二期受商文化的影响相当大,尤其是第二期,除陶鬲、甗、罐、盆和澄滤器等与二里岗商代前期同类器相同或相近外,青铜器数量和种类也增多,而且出现斝、爵、鬯等青铜容器,并与商前期的同类器相似。另外第一期出现的卜骨卜甲,到第二期开始盛行,反映了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17],与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到湖熟文化第三期,宁镇地区受商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但相形之下仍强于太湖流域,因此太伯、仲雍不太可能选择宁镇地区落脚。《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封师尚父于营丘……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国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又《尚书·费誓》云:“淮夷,徐戎并兴。攻鲁,使鲁东郊不开。”说明周初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封伯禽于鲁时尚遇到东夷人的顽强抵抗,何况名不正、言不顺的太伯、仲雍呢?因此江阴一带的文化环境,正是太伯、仲雍所要寻找的理想的立足地。

长江江阴段相对而言江面比较狭窄,最狭处仅1250米,利于渡江。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江阴春秋以后即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吴国即在江边黄山的席帽峰“筑石室,为烽火之所”(著名的江阴要塞亦在其上);战国时的春申君黄

歇在君山之麓留下了凿以溉田的黄田港,“君山”也因此而得名^[18]。上述是笔者认为太伯、仲雍奔荆蛮即江阴的第一点理由。

第二,《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这段文字透露出三点信息:一是太伯曾筑过城,时间在“殷之末”。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在江南地区发现了不少古城遗址,如武进的淹城、阖闾城、胥城、留城,高淳的固城,丹徒的朱方城、云阳城和浙江湖州的下菰城等,但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大多为春秋时期的城池遗存。早到商末周初的城,宁镇地区目前尚未发现,太湖流域除江阴的余城外亦未见有其它城。太伯、仲雍“奔荆蛮”到达“荆蛮”的时间是公元前1128年左右,但这不是筑城的时间。据《吴越春秋》载:太伯、仲雍奔父丧回到荆蛮,“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接下来便是“遭殷之末世衰……故太伯起城……。”说明太伯大约是在周太王死后即公元前1127年之后的若干年才筑城,而余城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1600~1000年,适在其范围之内;二是太伯所筑之城“周三里二百步,上郭三百余里”,“三里二百步”应指城的范围亦即城的周长,“外郭三百余里”当是其统治范围亦即指疆域而言^[19]。太伯当时的疆域有多大,目前尚不清楚,就“外郭三百余里”而言,其范围并不大,应该说比较符合太伯立国之初的实际情况。“三里二百步”是个大概数,算起来,接近2000米,而余城城墙周长约2000米,两者基本一致;三是太伯筑的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在西北隅”无疑是指城的方位,是在什么的西北隅呢?当然是指吴国后期都城苏州的西北隅,这与余城所处的位置完全吻合,因此“名曰故吴”。按方位,无锡的梅里亦“在西北隅”,但其不符合上述所论之其它情况,因此可将其排除在外。

第三,并于“荆蛮”问题,学术界争议颇多,或释族名,或释地名,或既可释族名,亦可释地名,笔者认为“荆蛮”既非族名,亦非具体地名,而是对某一区域包括这一区域内的各部族的泛称。《史记》索隐云:“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而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荆”即“楚”,学界没有多少异议,而“蛮”则较复杂。索隐“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似乎是说蛮=闽=南夷=越;《周礼·夏官·职方氏》载:“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

五戎、六狄之人民。”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四、八、七、九、五、六，周所服国数也。”显然《周礼》是将蛮和闽分而述之的，而郑玄则认为“闽、蛮之别也”这与索隐所记同。《逸周书·王会解》云：“共人玄贝”孔晁注：“共人，吴越人蛮。”又《逸周书》中述及的除共人外，还有东越、欧人、姑于越、且欧等，均属越，说明越系统内有很多民族，故俗云有“百越”。据张敏先生考证，宁镇地区为夷人之地，其族属为夷，称南淮夷，“西周金文中，常见南淮夷一语，许多学者皆认为南淮夷即淮夷，恐不尽然。南淮夷在金文中有时省称为南夷、淮夷，然与淮夷还是有一定区别的”^[20]。既然南淮夷与淮夷有一定区别，恐怕南淮夷与南夷亦应有区别。江阴一带属太湖流域文化区，学术界一般认为太湖流域属古越族^[21]，既然“蛮亦称越”，因此江阴一带古时被称作“蛮”有什么不可能！《史记》云太伯、仲雍“奔荆蛮”，并未说明“荆蛮”是族名还是地名，但从文字上看似乎为地名，但当不是实指某地，如果司马迁知道太伯、仲雍所奔之具体地望，定会详述，断不至含糊其词曰：“奔荆蛮”，因为为了寻找“故吴墟”，司马迁曾实地考察过苏州一带，无果。又《吴越春秋》载：“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衡山”无疑是地名，当为名闻遐尔之南岳衡山，不会是其它什么衡山。有人削足适履硬要在宁镇地区或别的地区找出一个衡山来，以符史载，且不论这些所谓衡山有无药可采，至少太伯、仲雍对这些名不经传的衡山未必知晓，更何况到衡山去采药本就是托词，其目的不言自明。所以太伯、仲雍所奔之地并不是以有无衡山为依据的。考《吴越春秋》这段文字的上下文，“衡山”与“荆蛮”是相对应的，“衡山”是地名，似乎“荆蛮”亦为地名。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江阴一带在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属越；到周显王三十六年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这一带又为楚所灭，属楚^[22]，所以《史记》索隐言“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

第四，“句吴”名称的来源，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太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据？）而为句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这里说明两点：一是“句吴”之名起于太伯、仲雍奔丧回来以后，亦即约公元前1127年，之前并无此称；二是周太王的死可能使太伯很伤感，人总是要死的，但国家不能随之灭亡，必须要传种接

代传下去，周太王死前已安排好了继承人，即“立季历以及昌”^[23]，而太伯无嗣，奈何？于是他想到了其弟仲雍，“故自号句吴”，“句吴”之名似与仲雍有关。《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史记·周本纪》云：“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云：“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显然仲雍即虞仲即吴仲，为一人，但与“句吴”有什么关系呢？据《汉书·地理志》句吴下颜师古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亦有人释“句吴”为“勾住吴仲”之意^[24]，恐不尽然。考“句”有“留”之意，如“句留”、“稽留”，白居易《春题湖上》即有“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句留在此湖”诗句^[25]；又吴国后期的青铜器上往往有“句敌”、“攻敌”、“攻吴”、“工敌”等字样，如吴王元剑有“攻敌王元”等字，据考证此剑为诸樊之剑^[26]；1979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陪葬坑出土的句敌夫人季子簠，共两件，是宋景公嫁其妹季子于吴的媵器，上有“句敌”等字^[27]；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吴王光戈有“攻敌王光自乍（作）”六字^[28]，光即吴王阖闾；吴王夫差鉴上有“攻吴王夫差”等字^[29]；吴王者减钟有“工敌王皮燃之子者减”等字，据郭沫若考证，“工敌”即“句吴”，者减即颇高^[30]。等等。吴王均自称为“攻敌王”、“句敌王”、“攻吴王”、“工敌王”，句、攻、工和敌、吴、敌均乃一声之转，音同字通^[31]，所以“攻敌”、“句敌”、“工敌”即“句吴”。值得注意的是，在余城的东北角，有一山名定山，其山西延突起的一个山峰叫“敌山”，高167.4米。据载，其“山脊有堆阜累累相比，其形如敌，俗名耙齿山。相传梁大同中有樵夫识金银气，掘之为石所压，一名贪山^[32]。”考“敌”亦名“楬”，古击乐器，用于雅乐结束时。《书·益稷》：“合止祝。”孔颖达疏：“乐之初，击祝以作之；乐将末，戛敌以止之。”又《尔雅·释乐》：“所以鼓敌谓之籥。”郭璞注：“敌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钜钶，刻以木，长尺，栎之籥者，其名。”“籥”为击敌的木棒；“钜钶”为齿状突起物^[33]。“敌”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太伯、仲雍当然知道，而花山、余城一带的土著居民恐怕未必知晓，故“敌山”得名可能与太伯、仲雍有关。“句吴”即“句敌”，又“虞仲”即“吴仲”，“吴”、“敌”、“虞”亦为一声之转，音同字通。因此，太伯“自号句吴”恐有两层意思：“一是留在敌山”（这个地方）；二是寄希望于仲雍将自己开创的基业能够流传下去，可谓一语双关。另“相传梁大同中有樵夫识金银气，掘之为石所压”一节，考敌山及敌

山附近并不产金银,历史上亦从未有过产金银的记载,估计这个樵夫借识金银气之名,行偷坟掘墓之实,不幸墓塌人亡。据考古发掘,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均未发现墓葬,一方面可能由于是抢救性考古发掘,限于揭露面积,另一方面可能另有墓地。2001年江苏省余城遗址联合发掘队曾在散山山凹内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墓葬,此墓封土呈馒头状,直径约40米,高约10米。结果向下发掘10余米,尚不见墓的影子,只在底部发现一用不规则石块垒成的石坎,石坎向坑壁内延伸,因未作进一步发掘,不清楚石坎延伸至何处。有人分析,此墓可能是“疑冢”,亦有人认为是城墙。为什么要设“疑冢”,又为什么在这么深的地方有城墙,值得思考。据调查,散山山凹内有此类馒头状土墩32个,一个挨一个山势分布,且从土墩表面观察,均明显有人工加工的痕迹。这些土墩是否是墓葬,它与余城遗址、花山遗址有什么关系,有待今后的工作。

第五,据《史记》、《吴越春秋》等史籍记载,太伯、仲雍所奔之地有“文身断发”习俗。考我国古代的广大地区均有“文身断发”的习俗,如《礼记·王制编》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战国策·赵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瓠越之民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文身断发”的原因据《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象鳞虫也。”《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江阴地处太湖平原,北枕长江,境内水网密布,据统计,江阴现在的水域占总面积的12.88%,河网的密度平均达每平方公里4.98公里。现在的月城、青阳、桐岐、峭岐、马镇等乡镇,原为芙蓉湖的一部分,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34]。另境内还曾有一湖,名暨湖,系芙蓉湖的支湖。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延陵为毗陵县,析境东部为属乡,因位于暨湖之北,故名暨阳乡^[35]。从地理位置上看,花山、余城一带适处原芙蓉湖边,故符合“陆事寡而水事众”这一情况,因“常在水中”,所以这里的土著居民便“断其发、文其身”。“断发”可能是为了在水中活动方便,“文身”可能是出于对水神的崇拜。而宁镇地区属低山丘陵地貌,水网相对较稀疏,应“陆事众”,不可能“水事众”。另《管子·小问篇》载:“昔吴干战,未此不得入军门,国子摘其齿,遂入为干国多。”“干”即“邗”,其

地约在今扬州至仪征一带的蜀岗丘陵区^[36]。据郭沫若考证:“邗国之灭可能在春秋以前,至迟亦当在春秋初年。”^[37]如此,则至迟在春秋初年吴国尚有拔牙习俗。拔牙习俗,其历史十分久远,新石器时代常州的圩墩遗址^[38]、上海青浦的崧泽遗址^[39]、昆山的绰墩遗址^[40]等出土的人骨架均发现有拔牙现象。拔牙习俗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成丁礼应是其中的一种,如大汶口和西夏侯墓葬中发现的人骨标本,多拔去上下犬齿和门齿,年龄多在14岁以上^[41],又如常州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共发掘出32座墓葬,其中16例人骨存在拔牙的现象,占50%,而且“在拔牙的个体中,年龄最小是20岁左右,说明圩墩遗址史前人类的拔牙施术年龄应是在20岁之前,即在成年——青年时期。”^[42]再如《管子·小问篇》所云因“未此”故“不得入军门”,也就是说尚未达到成丁年龄,所以不能当兵。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32座墓葬为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说明至迟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常州一带即有拔牙习俗。而江阴的花山遗址、余城遗址距常州的圩墩遗址近在咫尺,虽然两者年代不一,但由于地域和文化发展的一致性,拔牙习俗在这一地区应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而宁镇地区目前尚未见有拔牙这一现象的考古材料。

第六,江阴曾是季札的封邑。季札的事迹《左传》、《国语》、《史记》和《吴越春秋》等史籍均有记载。季札为吴王寿梦四子(小儿子),非常贤能,因此寿梦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但季札坚辞不受。临终前寿梦遗命长子诸樊“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43],要诸樊以兄弟传位的方式把王位传给季札,而实际情况并未如寿梦所愿。诸樊及之后的几代吴王都曾以王位相让,但均遭季札拒绝,故史有“三让天下”之称。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元年^[44],季札被封于延陵,江阴地属其封邑^[45]。延陵即今之常州(武进)。为什么要封季札于延陵,史无记载,但考季札甘让王位的这种义举和德操适与他们的始祖太伯当年让位于季历及昌何其相似乃尔。《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史记·周本记》和《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亦有相同的记载。封季札于太伯、仲雍初奔之地,可能就是为了表彰其与太伯有同样的义德,可谓用心良苦。季札在延陵邑的确切居地,目前尚不清楚,一般认为是今常州市区一带,亦有人认为是淹城^[46],但不论怎样,当不会

离太伯、仲雍初奔之地太远,实际上也不可能远,因为常州(武进)距江阴的花山和余城两遗址仅30余公里。江阴和常武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同风同俗,到商末周初又经太伯、仲雍的苦心经营,从文化上更是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所以封季札于延陵当视同封季札于江阴,况且据《史记·吴太伯传》注:“延陵季子家在毗陵县暨阳乡。”毗陵即常州(武进),暨阳即江阴,据说今江阴申港镇申港中学内的一个土墩即季札墓,墓高4米,面积为2694平方米^[47]。

第七,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这与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所出遗物情况基本吻合。花山遗址以夹砂陶器即炊器为主,泥质陶次之,一般而言,炊器的数量在一定时间内与人口的数量成正比。太伯、仲雍“奔荆蛮”到达花山,不可能只有“二人”,一定有一定数量的随员,之后因感太伯之义,又不断有人归附,加上原有的土著居民,所以花山人口骤增,表现在文化面貌上即以炊器为主;余城遗址则以泥质陶为主,炊器次之,而泥质陶又以罐、盆、豆等盛食器为主,另外余城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数量也远远超过花山遗址,发掘者认为花山和余城是一个整体,一个是城,一个是郊,可能“城内居民所用器物的规格更高于城外居民”^[48]。这个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四 结语

通过上述论证,本文认为江阴地处太湖流域或宁镇地区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相对而言,是文化的弱势地区,符合太伯、仲雍所要选择的理想的立足点要求;“荆蛮”不是族名,也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对某一区域的泛称;“句吴”是国名,“句”有“留”之意,“吴”即仲雍,且花山、余城附近有“敌山”,因“句吴”即“句敌”,故“句吴”有留在敌山并希望仲雍将国传下去之意;花山遗址、余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文化内涵等可与太伯、仲雍“奔荆蛮”的文献记载相印证等等。因此太伯、仲雍“奔荆蛮”的地望为今江苏江阴,具体地点为花山和余城,余城为太伯所筑,并可能是最初的立国地。

[1][16]邹厚本等:《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2][31]尹盛平:《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问题》,《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

[3][5][7]江苏花山遗址联合考古队:《江阴花山夏商文化遗址》,《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

[4][6][9][48]江苏余城遗址联合考古队:《江阴余城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

[8][10]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11]朱友华,殷伟仁:《关于勾吴开国史的几点分析》,《传统文化研究》,古吴轩出版社1994年。

[12]全草,仲明:《“吴”之源流浅探》,《民主》1993年第2期。

[13]《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武乙二十一年》。

[14]《夏商周年表》,《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

[15][17][20][36]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周年纪念文集》,南京博物院编1993年。

[18][32][34][35][45][47]江苏省江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阴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魏嵩山:《古代吴立国的发源地及其疆域变迁》,《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21]曾昭燏,尹焕章:《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

[22][44]江苏省武进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进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3]《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周本纪》。

[24]谢忱:《勾吴史新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25][3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2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

[27]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28]孙稚雉:《金文著录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

[29]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

[30]王煦华:《先秦的吴地诗歌》,《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

[37]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

[38]陈丽华等:《1985年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陈晶:《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9]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40]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41]湖北省博物馆等:《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42]李民昌:《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人骨鉴定》,《东南文化》1996年第11期。

[43]《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46]车广锦:《淹城即季札延陵邑考》,《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选》,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